

论游牧民的社会、经济与政权

——读《游牧者及其外部世界》

乌日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市, 100871)

摘要: 哈扎诺夫的《游牧者及其外部世界》作为讨论游牧社会的历史、经济与政治形态的集大成者, 用丰富的田野案例来详细阐释了游牧社会的类型、游牧社会的组织形态、游牧社会的社会分化以及其与周围不同社会的互动模式。在讨论农牧社会形态对比、农牧业起源以及内亚历史上不同政权之间的互动模式时不得不反复引用哈扎诺夫的《游牧者及其外部世界》。本文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结构与内容, 并在最后笔者作出了评述。

关键词: 游牧畜牧业; 游牧社会组织类型; 互动模式

中国图书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一. 引言

有关内亚草原上的游牧或畜牧业的讨论,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以生态、文化、生计等主要面向。阿拉坦宝力格¹和彭兆荣²等人专门论述过有关牧区的人类学研究文献。他们的论述中将有关牧区的文献分为以下几种: 围绕文明形态的讨论、围绕族群文化与特定经济形态之关系的讨论以及围绕生态问题以及特定生计模式之关系的讨论。

有关文明形态的讨论主要以农牧互动关系以及追溯游牧历史起源为其主题, 并成为内亚历史学中的主导范式, 如拉铁摩尔³、巴菲尔德⁴、狄宇宙⁵、王明珂⁶等人的研究。这些学者的著作都从游牧经济相较于农业经济的劣势特点出发, 论述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必然性。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尤其在与其定居国家和定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 经历了原本

¹ 阿拉坦宝力格: “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年第2期, 第75-82页。

² 彭兆荣、李春霞、葛荣玲: “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 第45-54+163-164页。

³ 欧文·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唐晓峰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年。

⁴ 巴菲尔德: 《危险的边疆: 游牧各帝国与中国》, 袁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

⁵ Di Cosmo 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⁶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

依循其内部动力而无法发展出的变革: 社会分化加剧; 世袭贵族诞生; 阶层、阶级的出现等。上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 理想状态下的游牧社会是一个趋于平等主义的社会, 财富积累和消散总是展现出周期循环的特征。社区内部的互助机制是游牧社会的生存之关键, 它能够抵御周期性的牲畜群消亡和填补季节性劳动缺口。但游牧社会从来没有在真空状态中生存过, 游牧经济的特征使得其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而在此过程中游牧社会偏离了理想状态下的发展轨迹。

因此要讨论农牧关系、游牧社会内部的社会结构与变迁等问题, 哈扎诺夫所著《游牧者及其外部世界》(*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一书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与开创者。该书第一版于1984年由英国剑桥出版社出版, 第二版于1994年由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这本著作还未译介到国内, 因此本书评在阅读其英文原著的基础上完成。

二、游牧经济和游牧类型

(一) 游牧类型

今天的游牧民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被定居世界的当代经济和政治体系所容纳, 而其过程通常与过去的方式不同, 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因此, 在一本讨论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书中, 讨论这种相互关系的源头是十分必要的。⁷

作者将游牧经济的主要特征总结如下: 1) 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 2) 畜牧业主要是全年无休地自由放牧而不以固定棚户为辅助; 3) 按照畜牧经济需求进行周期性游动(Mobility), 其游动范围在确定的土地区域内或者跨越区域边界; 4) 所有人口或者人口的大多数参与到上述经济活动中; 5) 其食物生产主要面向基本的生存需求, 这与当今的奶牛工厂或者其它工业化圈养模式不同。过去的畜牧业生产并不针对获得特定的利润, 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仍被用作与外部世界的贸易或交换。游牧经济不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 因此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多是为了补充生计缺口。上述经济学方面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与游牧社会的其它方面紧密相连, 也决定了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特征。

作者继而将畜牧业划分为以下类型: 1) 纯粹游牧(Pastoral nomadism)。这是畜牧业中最为纯粹的形式, 其中没有任何农业实践的踪迹。但这种纯粹的游牧形式只有在几个地区曾短暂地出现过, 而且即使在这种形式活跃的时期也始终与其它的畜牧业共存。2) 半游牧-畜牧业(Semi-nomadic pastoralism)。该类型的主要特点是以周期性游动放牧为主, 而以农业和

⁷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16.

定居化生产作为补充。在某些情况下半游牧-畜牧业可以是相对稳定的经济系统,并且能够长期地发挥其功能,但有时它可能是从纯畜牧业到其它混合经济的过渡形式。那些传统上一直被认为是游牧民的人群——如斯基泰、匈奴、可萨人、蒙古人和土库曼人等,其实都是半游牧-畜牧民。3) 半定居牧业 (Semi-sedentary pastoralism)。该类型与上述类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农业实践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这一类型的畜牧业有周期性游动,但其游动周期、时间和距离较短,且并非所有劳动力都投入到畜牧业中。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吉尔吉斯人只花费三到三个半月时间游动,并且每个家庭只有少数人——通常是男性跟随畜群游动。4) 专人牧业 (Herdsman husbandry)。该类型中人口大多数参与到定居农业,而畜群饲养在专门的牧场围栏里,常年依靠草料,且有专人司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乌兹别克人就在春、夏两季将羊群饲养在专门的牧场上,秋、冬两季则将羊群圈养在定居点附近,而放牧技术由专门的家族一代又一代传承。5) 夏季高地牧业 (Yaylag pastoralism)。属于该类型的牧民,夏季将畜群放牧于高山牧场,而剩余的季节将其赶至低地背风处。在内亚草原、中东和北非夏季高山牧业通常与半游牧-畜牧业并存。6) 定居畜牧业。该类型中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圈养畜群,并且用储备饲料作为畜群摄入而不是在不同牧场间的游动。这些分类并不是学者以“上帝视角”对游牧民及其经济实践类型的划分,而是基于游牧民本身的主体性认知。例如16世纪时期的有关布哈拉汗国的文献显示,当时人们划分住在村庄里的人和住在草原上的人,其主要的划分依据便是是否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实践。⁸

上述游牧类型很多时候以一种混合的形式存在,一个地区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游牧经济。决定这种类型划分的还有诸如畜群结构、畜群规模、对不同生态区域的利用方式、放牧游动的主要特征、游牧经济中对不同产品和食品的使用等指标。作者以上述指标作为参数,论证不同地理范围内的游牧经济类型。

简单介绍作者所描绘的内亚地区游牧类型,有助于理解上述分类。

内亚地区的畜群结构主要由羊和马组成。羊能够进食的草植物类型非常宽泛,其中包括很多马和其它牲畜无法消化的植物,且在寒冷的冬天它们能够刨开15-17厘米厚的积雪。而马在内亚地区的作用与如骆驼在沙漠地带的作用相似,作为主要的牵引动物或者乘骑而存在。与绵羊不同,山羊地位较弱,只在戈壁、山地和荒漠地区被饲养。大畜,如牛的饲养在内亚地区的畜群结构中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牛群不能长距离游动。

早期的内亚牧民没有储存草料的习惯,因此需要马蹄将积雪刨开,为其它小畜的进食提

⁸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25.

供方便。除了少数几个山地地区牧民需要进行全年垂直性游动之外,内亚草原上牧民的游动路线更为线性、更有规律性和更具稳定性(这种稳定甚至从远古时期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其游动原则有夏季优先考虑水源的接近性,而草料是主导剩余三个季节游动的线索。对大多数牧民来说,能使牲畜贴膘的夏季牧场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冬季的寒冷、贫乏和风暴等。作者做过民族志调研的中亚地区,一只绵羊需要1公顷的牧场;而在荒漠草原,一只绵羊需要3-6公顷草场。内亚地区牧民的游动距离在100公里到150公里之间,游动距离的长短主要与草场的质量和特定地理环境内牲畜所能够进食的草植物的密疏相关。

(二) 牧场、畜群与人群规模

人类学家费雷德里克·巴斯和其它更多的学者认为,畜牧业中最重要的需求是寻找资源可用性、畜群规模以及人口数量之间的平衡。巴斯指出,除非有技术支持草饲料的储存,否则绝对人口数受到一年中牧场最低生产率时期承载量的限制。⁹然而,哈扎诺夫认为,牧场与人口承载量并不直接发生联系,二者之间还有关键一环——畜群规模,牧民会主动根据年份光景差异来调整畜群规模。

当今,社会平衡问题会随着牧民卷入市场经济的程度而有所不同。然而对市场经济的依存性是现代特征,并且也不是所有牧民都受其影响。即使是在今天,某些旨在通过当代技术手段促进传统畜牧业的措施常常无法实现其目标,甚至有时其后果是意料之外的,其一便是牧场的过度使用。在畜牧业中只能实现短暂地平衡,这种平衡得到维持的唯一方法便是对三个变量的操纵和调整:牧场、人口和畜群规模。它们各自受到不同因素的决定,这些因素有时是恒定的,而有时是暂时的。气候环境可以直接影响牧场的生产力;动物疾病或者周期性地自然灾害,如风暴(*jute*)可能一下子杀死大部分牲畜。这些外部因素会平衡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长期的畜群规模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短期的增长很快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快速消减。在这种情况下,在光景好的年份努力扩大畜群数量或许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因为足够大的畜群规模可以作为抵御不可预期的灾害的保险。

畜牧经济虽然可以部分地实现经济系统的自主运作,但由于其专门性和片面性而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可以总结出,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非自给自足性可以由以下两个途径来解决。首先是定居化。定居化的代价通常是基础社会结构的破产。而另一方面,定居化常常作为一种临时性方案来使用,之后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回到畜牧业。事实上,畜牧业获得发展的地区通常都无法使农业“有利可图”。因此真正的定居化的实现要么是因为牧民转移到完全

⁹ 转引自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70.

不同的生态区域或者被强制定居化。只有农业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才会使牧民完全地定居化。而在牧民中,最早实现定居化的往往是那些最为贫穷的人。第二种方法是运用不同的方式从临近的定居人群处获得所需产品。这一选择表明游牧民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三) 游牧社会的组织

由于游牧社会不是完全的自给自足(Non-autarky),因此其社会政治组织也不会是完全自主的。他们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发展程度的影响,因此更多时候游牧社会与临近的农业社会更相似而不是与其它地区的游牧民社会更相似。分析游牧社会的政治组织时应由内、外两个方面去考察,其社会内部的需求以及功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所受到的刺激。¹⁰

作者认为,游牧社会的经济关系可以为畜群的私有和牧场的公有。在法律意义上,畜群私有制是绝对的,但事实上畜群私有制与很多其它补充性制度共存,如互助系统、畜群再分配等。牧场公有制相对更加复杂。牧场公有制的一种极端形式是某一块土地由某一社会组织单位所共有,并且没有事实上的区域划分。游牧社会对关键资源的公有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环境和气候的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与该游牧社会本身的规模。

很多材料表明游牧社会中的家庭由不超过两代的人组成。核心家庭由父母和未婚子女构成,内亚草原最常见的是已婚幼子随父母居住,继承分给兄长之后留下来的财产和父母的毡房,因此幼子被认为是接替祖先“炉火”(Hearth)的人。草原上共同放牧,相互构成支持网络的初级亲属群体中的所有家庭各自管理所属牲畜群,它与扩展家庭或家户联合体是不同的组织。根据考古发现,随着游牧民的定居化倾向越来越重,他们的核心家庭规模会越来越大。游牧社会家庭中的劳动力需求比定居农耕社会的小,一个家户中的劳动力短缺通常只是短暂的、季节性的,且只出现在某段劳动周期内。这一缺口会由游牧民间的互助制度补充,因此可见没有一个家户可以独立完成所有的生产周期。

不同地区、不同游牧社会中社区的基本特征和其内部的社会关系不相同,但仍然可以总结出几个共同点。首先,社区与关键资源的关系。牧场是社区公有,同时其使用权也是共享的,对于夏季牧场的共享尤其重要。内亚草原的夏季牧场上共同放牧的不仅有独立的几个社区,也有比社区更高层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一个社区由几个家户形成,他们全年或季节性地在牧场间转移。作者根据不同的民族志材料得出,内亚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一般由2-4个家

¹⁰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123.

户组成一个社区,蒙古人的社区由5-6个家户组成¹¹。游牧社会中,社区与初级亲属群体并不常常吻合,很多时候组成一个社区的成员之间只有姻亲和远亲。初阶的游牧社区共同组成二阶社区,后者的成员们会在一年中的特定季节共同使用牧场和水源,共同转场并且根据建立的联系实施互助制度。同时根据对关键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二阶社区或许会组成更大的三阶社区。第三,游牧社会中的人员流动比定居农耕社会中的更加随意,出于季节、畜群规模、牧场生产力和水源的状态等不同原因,牧民会分开游动,但值得强调的是,核心社区——即初级社区的人通常都一起转场。事实上,游牧社会组织单位的非中心化、脆弱、以国家或军事政权形式提供安全保障的缺乏会导致社区内部的聚合,而任何一个稳定的和安全的环境都会分离牧民社区¹²。第四,尽管社区成员由诸多复杂的亲属关系凝聚,但游牧社区的形成首先由临近性和生产方式需求所决定。这样,畜群的私有权和家户的独立生产才有可能。社区中的互助体系也有两个方面,首先是临近原则,即按照生产需求,相邻的家户之间互助;其次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互助,如聘礼的共同支付、参与血仇等。初阶社区的出现主要是出于生产的需求,其成员关系多样、形式不一,但二阶和三阶社区要么是在对关键资源的共同所有基础上或者出于其它社会功能的需求而形成。共同放牧的动机是出于纯粹的生产需求,夏季当家畜被吸血昆虫和其它飞虫困扰时,大规模的畜群更易于看护。

游牧社会中的地域概念由亲属关系实现和巩固,由于游牧社会中的流动性,亲属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但要说任何游牧社会的形态都是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那就有失偏颇。首先任何不同的经济系统中亲属关系都可以是社会的结构基础,其次,即使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亲属关系来定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它形式的社会政治组织产生的空间。由于游牧民的流动性和其经济的长期不稳定性促成了较为灵活的社会组织,且有专门的组织原则来应对这种易变性,在大多数的游牧社会中这种组织原则的基础是继嗣群(Descent group)。由于继嗣原则的使用,复杂而多层次的游牧社会组织便可以被表达为不同分支的复数,不同家系分支组成的继嗣群有能力裂变或融合。但事实上,上述组织原则只有在纯游牧社会才是完全可行的,在半游牧-畜牧社会(Semi-nomadic pastoralism)以及其它混合经济形式的社会中,上述原则并不是发挥功效的唯一因素。低层级分支中社会关系主要基于生产需求和契约性的关系,而在高层级分支的组织原则通常基于继嗣。亲属关系通过取代不同继嗣群中的离散特征来调节个人在水平系统中的位置,因此只能控制相对较

¹¹ Симуков, А. Д., et al. *труды о монголии и для монголии (том 2)*, Гос. музей этнологии, Осака, 2007:493-507.

¹²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134.

小的人群,而继嗣群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关系,同时建立个体在整个社会及其特定细分领域的成员资格,这种资格涉及相应的权利和承诺,有时涉及社会地位。从上述可得出,亲属关系建立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而继嗣规则合法化这个位置。

游牧社会中的上层政治分支是变化多端的,他们随着政治功能的需求而变的重要,同时也会由于对于他们的需求的消退而变得不足轻重。牧民生计的生产周期的完成只需要最低层级的社会组织便足够,即只需要家户和社区间的互助制度就能够完成所有劳动。高级别的社会组织并不直接成形于生产过程,它们的产生基于政治因素,但它们一旦形成便会实现其它的经济功能,且随着游牧社会的政治整合性的加强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关键资源的分配、转场路线的建立和控制、生产程序的顺序、防御、战争、与定居世界的联系等。这几个需求可分为三个类别:一个游牧单位内便可以解决的;游牧单位之间要解决的;游牧单位和定居世界之间需要解决的。上述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对重要性决定了游牧社会的政治整合性、权力的制度化和集中程度。

(四) 游牧社会的分化

游牧社会的分化有三个潜在动因,即畜群规模的差异、与其它游牧社会的互动和与定居社会的互动。

畜群私有、劳动周期的不同和游牧社会本身具有的不稳定性必然会导致财产不均,这意味着一些个体和他们的家庭总是比别人拥有更多的牲畜。当不平等现象加剧时,社区内的互助机制会受到削弱。一个物质财产越来越少的家户会成为对社区内最不满的成员,甚至可能导致贫穷家户脱离原社区或者过度依赖于富裕家户。劳动力需求大的牧户可以依靠社区内较为穷困的成员来填补缺口,提供劳动力的社区成员和需求劳动力的社区成员间不一定总是由亲属关系作为纽带。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模式在扮演着阻碍财产不均继续发展的因素。当一个穷困牧户无法获得维持其生存的最低需求的牲畜数量时,除了参与上述的互助机制,另外的出路就是部分或完全地定居化。互助机制中的富裕一方所需的劳动力需求小于穷困牧户的数量时,则永远有一批穷困牧户被排除于游牧社会之外。事实上,由于每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的冬季风暴(*Jute*)和牧场生产力的不稳定限制了牲畜数量的无限增长,即使有了畜群规模的涨幅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财产差异在不断地扩大。由于生产和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合作和互助机制会有限制社会分化的作用,即使不是在限制牲畜规模差异的扩大方面,也起码是在畜产品的使用方式方面,否则游牧社会将面临危机。

财产不均的情况很多时候只是暂时的,但它仍然能够促使社会流动,并促成某些群体获得较高的地位从而促进社会分化。但后者很少有能演变成一个稳定的世系社会阶层。因此,作者认为拉铁摩尔所得出的结论¹³——财富倾向于成为世系的,正是这样部落贵族才得以诞生——过于简单且不甚准确。作者认为,游牧社会中的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主要是与外界因素联系在一起。游牧民中的财产不平等会导致两种情形,一个是游牧政权的出现,二是依附于定居社会的情况出现。在前一个情形中,政权作为财产所有权的保障削弱本有的再分配机制。

当游牧社会中需要专门的政治权力以及与其相应的专门化的领导和治理功能时,社会不平等才会出现。这种权力的三种来源是:内部组织治理的需求、与其它游牧社会的互动的需求、与定居农业社会互动的需求。这三种需求不仅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出现,也会决定其它社会成员的地位,并有利于向世袭贵族社会转变的条件形成。游牧贵族因其作为统治阶级而获得拥有特权的资格。这些特权用于占有最好的牧场,获得自愿的贡赋和变相的税收。

第二个社会分化的来源在于与其它游牧社会的互动中,尤其是当这种互动导致一个游牧群体对另外一个游牧群体的服从时。然而,相对于另外的群体占据优势的社会分化也是不稳定和不长久的。这是因为游牧社会的流动性、政治体制的落后以及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的缺乏。某些游牧民群体对另外的游牧群体的支配地位的长期稳定取决于在经济专业化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支配群体和服从群体间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共同与外部非游牧世界对抗时。

第三个社会分化的主要机制是由于与外部定居化农业社会的互动所致。游牧社会内部的发展并没有为稳定的社会分化提供足够的机会,外部因素必然起到稳定作用。这些因素是非常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被征服和剥削的农业社会所提供的盈余以及为了将影响力延伸至被征服的游牧民中而由定居政权所给予的社会支持。起初为了经济原因而产生的与定居农业社会的联系导致了游牧社会内部分化的发展和巩固。这种分化演变为等级、财产甚至阶级差异。最终,游牧贵族、精英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于经济原因,而多了一些社会原因。

所有类型的游牧都是非自给自足的,因此不能独立于外部世界而生存,其差异存在于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模式而不在于其需求和目的。游牧社会内部的分化倾向越大,则其与外部世界接触就更积极,而反过来与外部世界深入地和多层面地接触促使游牧社会内部的分化和贫

¹³ Lattimore O., Herdsmen, farmers, urban culture. In: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79-490.

富差距的加剧。因此,当说到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时,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单一方向的因果关系,其中有更为复杂的机理。以何种方式接触外部世界取决于其内部的经济需求,同时也取决于某些阶层和群体的社会政治抱负。当然,在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将定居世界视为背景,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活跃的力量。综上所述,游牧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接触产生了多样的结果。

(五) 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模式

1. 定居化

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互动中最为极端的结果为定居化、农业生产的增加和手工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定居总是与游牧社会的解体和其社会组织的本质性转变相关,而并不是所有的阶层和群体都会从转变过程中获得同等的益处。显而易见的是随着定居化的加剧,土地的私有权的倾向也会随之加剧。对于游牧民而言,定居化过程中最有挑战性的是适应生态环境。在此之前,游牧民一直在无法耕种的生态区域内进行较为单一的放牧实践,在实行半游牧-畜牧业的地区只有在有限的边缘地带才有可能发展农业。而即使是在边缘地区内的农业也不如传统上一直务农的区域发达。但恰恰是这些地区,由于受到气候变迁、历史情境以及不同力量对比的变化,体现了游牧社会与定居农业社会之间易变的界线。这意味着,在一些情境中游牧民由于牧场减少或者定居政权相应政策的变化而放弃畜牧业转而务农;同时在另外一些情境中农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耕地,而开始进行畜牧业的实践。

在游牧民生活的区域内,农业只有在由灌溉体系、大量的资本投资和具体的农业技术的引进下才有可能产生收益,而且并不是所有区域都产生收益。成功的、完全的大规模定居化只有在迁徙到完全适于务农的生态区域才有可能。这样的迁徙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有时候这样的迁徙是一种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行动,但更多时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游牧民与定居世界互动的自然结果。

2. 贸易和中介贸易 (Mediatory trade)

定居化是一种完全的生计方式转换,而那些仍然保留了游牧生活方式的社会,他们在与外部世界接触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适应模式,如贸易或中介贸易。在进入更详细的说明前,需要区分两种形式的贸易,第一个是与农业和城市社会之间的直接贸易,第二个是作为不同游牧社会间的中介而参与贸易或者提供与贸易相关的其它服务。不同游牧群体间的贸易或者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直接贸易有许多障碍要克服,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游牧民的经济生产并

不太多的涉及市场, 比如根据有学者统计, 20 世纪 30 年代前的蒙古国普通牧民每年只将其全部产品的 30% 用于贸易。¹⁴

由于经济形式的单一性, 游牧社会很少有可出售的剩余产品。定居社会的经济形式更加复杂多元, 因此在经济上更加独立, 比游牧民更有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定居社会与游牧民产生贸易联系, 很多情况下发生于游牧民对该地区的征服之后。而在游牧民与定居民的贸易中, 前者对后者所生产的手工艺品以及农业产品付诸更多的兴趣, 因为游牧社会中很难发展专门化的手工业部门。

内亚草原游牧民与定居世界之间的交易特征具有以下两个要素: 生态环境要素以及政治因素。由于游牧民和农民所栖居的生态环境的不同, 造成了不便于贸易的很多障碍。例如, 牲畜和其它产品必须运输很远的距离才能到达与定居民交易的地带。因此, 游牧民有时征服其它地域或者迁徙到其它地域的很大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出于与市场更接近的目的。例如, 蒙古对于中亚的征服就起因于花刺子模沙关闭从蒙古到中亚的贸易路线。¹⁵ 中东游牧民和定居民之间贸易联系更紧密既有历史原因, 也有生态原因。该地区的农业定居民主要生活在绿洲附近, 并且被军事力量强大的游牧民所包围。内部市场的狭隘和外部贸易连接的不稳定性意味着定居民的手工业和贸易主要用于满足游牧民的需求。游牧民从绿洲定居民处获取小米、枣和其它农产品, 而绿洲定居民需要游牧民的肉食、黄油、奶酪等牧业产品。

间接贸易, 即在长途商队贸易途中为商人出售或租借运输动物, 以及维护车辆、提供食物等其它类型的服务。间接贸易能够比直接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游牧民所在的地理位置, 流动性和大型运输动物的所有使他们具有了绝对的优势。

内亚草原游牧民中能够参与类似间接贸易的机会很有限, 而且只有少数几个群体能够将其作为补充性的收益来源。尽管如此, 内亚草原仍有著名的间接贸易路线——古代丝绸之路。游牧民只有在强有力地控制商队所经地域时才能够从参与丝绸之路的间接贸易中获得收益。否则, 从中国出发的商队在选择路线时会故意绕开没有强有力的政权而正处于战乱中的地带。内亚草原上的商队贸易由定居世界的专业商人来经营, 比如唐代丝绸之路由中亚粟特人经营, 后来由中亚的景教徒和穆斯林商人经营; 伏尔加河贸易路线由来自花刺子模和周边哈里发的商人经营。在试图垄断贸易的过程中, 他们有时会形成类似于行会的组织, 并试图从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商队贸易首先与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紧密相关, 游牧民可以参与这类间接贸易, 并且使其为己所用。但是, 他们既不是创造这一形式的群体, 也不能够决定这类

¹⁴ Khazanov A. M.,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202.

¹⁵ 拉施特. 《史集》(第一卷第二册), 余大钧、周建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320.

贸易的发展和走向。

综上所述,从经济方面来说与定居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贸易对于游牧民而言至关重要,他们从中获得的并不是利益,所获得的更多是生存所需。

三、评述

(一) 哈扎诺夫的游牧起源观:与拉铁摩尔的对比

哈扎诺夫在本书中首先对游牧经济及其类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很多时候,学者们在谈论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关系时,总是假定游牧民社会为一体的,从而忽略了其异质性。因此,了解由不同地理区域特征和不同游牧类型交叉而成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哈扎诺夫提出了游牧社会共有特征,即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非自给自足性。在不同的游牧社会中广泛共有上述两个特质成为了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内驱力,也决定了互动的主要模式。

在哈扎诺夫划分的不同地理区域中,唯有内亚草原具有最为绵长的与定居世界的“互动带”。而这一“互动带”中,参与历史最悠久的便是古代中国和其北部“睦邻”。拉铁摩尔与哈扎诺夫都认为,定居政权在与游牧民相接的地带会筑造防御工事。此外,拉铁摩尔还认为,古代中国的长城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堡垒线——因为事实上它所起的防御作用很有限,围绕长城形成了一个边疆地带。这一边疆地带不是指界限分明的游牧民社会和定居社会的对立,而是指在这一地带形成了混合的经济模式。拉铁摩尔总结的“长城边疆”根据的是其游牧起源观。他认为游牧经济的起源晚于农业经济的专门化阶段,这是由于游牧经济中的关键角色——牲畜的驯化,只有在定居社会中才有可能完成。“在人类能够依赖放牧牲畜在草原上生活以前,必须先知道如何管理牲畜,而在知道这种管理牲畜的技术之前,又必须依赖其它方法生活,因此,驯化牲畜不是孤立发展的技术,而是在其它生活方式的保障之下逐渐发展而成。”¹⁶也就是说游牧形式是游牧民生产历史中的极端形式,它源起于草原边缘区域的混合经济形式。¹⁷根据拉铁摩尔,纯粹的游牧是从边疆地带的混合经济中发源,而不是相反的过程。边疆地带的混合经济变成草原深处的游牧经济,中间经历了战争和人口的压力,因此一部分人口迁徙到更远处的草原成为游牧民。战争的缘由是争夺贸易权及其利润和从农业社会所获得的贡献和税收。通过获得边疆争端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游牧统治,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际掌管权力的人定居于税收高的地区,而军士们则留在草原后方从事游牧生活。这种矛

¹⁶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224.

¹⁷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352

盾的逐渐扩大会导致游牧统治的结束,从而循环往复。因此,拉铁摩尔认为,最为贫穷的人是极为极端的游牧民。

而哈扎诺夫认为,游牧经济的起源并不是如拉铁摩尔所说的混合经济到游牧经济的单一路径,不同地区出现的游牧经济所受到的外部刺激是多样的。哈扎诺夫认为动物的驯化首先发生在有剩余植物性食物的定居社会中,食物生产经济(food producing economy)方式的扩散主要得益于人口迁徙和借用。从定居农业社会迁徙出来的人口,到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其中包括驯化新的动物物种。更具有游动性倾向的畜牧业和定居化的畜牧业共存了一段时间,二者根据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反应而分化发展,而二者的分离所受到的刺激,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的特征。哈扎诺夫认为马的驯化对于游动性畜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游动性畜牧业的发展还有以下前提,即长期的游动实践以及对更加多样的畜牧业的实践;动物奶的使用技术的发展;动物牵引轮车的出现;以及公元前2千年开始出现在欧洲和哈萨克草原上的牧马技术。哈扎诺夫认为,食物生产经济最初在公元前6-5千年从巴尔干半岛传入西部内亚草原,而最早的游动畜牧业踪迹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时期。真正与定居食物生产经济的分离发生在公元前2千年到1千年之间,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全球性的干旱化。这一气候变化使得草原居民完全放弃定居化的农业生产,转而从事更为游动的畜牧业生产。哈扎诺夫认为内亚草原西部比其东部更早地出现了更具游动性的畜牧业,东部内亚的畜牧业发展受到了来自西部的压力。依据考古学的证据,公元前1千年左右,牧民从现在的内亚和阿尔泰山地区进入到蒙古高原。与拉铁摩尔畜牧业观点不同,哈扎诺夫认为,从西部来的牧民更多地受到了古代中国北部农民群体的同化。

哈扎诺夫在本书中论证的观点更多受到其游牧起源观的指导,虽然哈扎诺夫肯定游牧经济的产生来源于定居化农业经济,但是两种经济模式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分离地较为彻底。他在论证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时,其出发点是游牧经济本身的特点,即不稳定性而非自给自足性。游牧经济中,即使按照主观意愿而追求畜群的无限扩大,牧民们总是在几年一次的冬季暴风雪和气候干燥而导致的牧草产量低的原因而失去大部分动物。因此,与拉铁摩尔的观点相反,草原上最穷困的人是那些最早受到游牧经济特性的影响而被迫定居化的人。

另一方面,游牧经济的非自给自足性成为他们必须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的内驱力。当然,由于游牧经济的上述特性,游牧社会本身中很难聚集财富,而其财产差异不至于大到能够促使大规模的社会分化。因而,游牧社会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了多样的社会关系形态。游牧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模式具有循环特征,且其社会分化和权力集中程度随着与其紧密相连的定居政权的强大而加深。

(二) 有关游牧经济特征的不同意见

哈扎诺夫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类型学——游牧的类型、游牧的地理区域类型、游牧社区的类型、游牧民和定居社会的互动类型过程等——来阐述他的论点。但在诸多宏观类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案例、不同王朝兴衰交替的背景中穿梭自如时，本书中始终没有出现对哈扎诺夫笔下所谓“普通牧民”的主体性描述。

与哈扎诺夫在本书中所采用的宏观路径不同，更多学者通过对微型游牧社区的观察讨论游牧经济的特性和现状，比如《游牧的终结？：内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¹⁸《变迁中的内蒙古：游牧社会与国家》¹⁹《长城之外：内蒙古草原上的环境、身份与发展》²⁰《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²¹《珍贵的草原：去往市场经济路上的蒙古畜牧业》²²《“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社区的生态、权力与道德》²³《自然的脱嵌：建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²⁴等。上述著作主要讨论20世纪后期以来，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的游牧经济变迁及其与特定资源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得出了与哈扎诺夫稍许相左的观点。例如《游牧的终结？：内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一书中，作者通过对俄罗斯、蒙古和中国等三个国家的四个游牧社区观察和对比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反驳了哈扎诺夫在《游牧者与外部世界》中的逻辑起点：游牧经济无法独立生存，其单一性是受到定居世界制约的关键因素。《游牧的终结？：内亚的社会、国家与环境》一书的作者认为，游牧是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并且也是与定居城市高度融合的生活方式。前苏联时期集体化牧场中沿用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在特定的牧场饲养特定的牲畜，集体牧场成员之间确定劳动分工，设置专门的牧马人、牧羊人和负责家务劳动的人。集体化时代的牧场公有也是一个优势，牧民可以进行长距离的游动，根据季节周期安排相应的劳动力，并在相对局限的资源环境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实现畜群的规模化。根据上述作者，20世纪初的蒙古草原也有类似的规模化专业生产，即王公贵族、僧侣集团、官员和富户拥有大量的牲畜，他们雇佣大部分的普通牧民，按牲畜种类实行专业化放牧，附属牧民每年的收入即是小部分的牲畜羔仔。另一方面，汉弗莱（C. Humphrey）认为，城镇化很难用定居或游动来定义。实际上，游动性与定居城市并不总是相互排斥。在牲

¹⁸ Humphrey C., Sneath D., Sneath D. A., *The end of Nomadism?: Society,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¹⁹ Sneath D.,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2000.

²⁰ Williams D M., *Beyond great walls: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Chines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²¹ 李儿只斤·布仁赛音:《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社会的形成》，娜仁格日勒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²² Bruun O., *Precious steppe: Mongolian nomadic pastoralists in pursuit of the market*. Lexington Books, 2006.

²³ 荀丽丽:《“失序”的自然：一个草原社区的生态、权力与道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²⁴ 张雯:《自然的脱嵌：建国以来一个草原牧区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知识产权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

畜财富的支持下, 蒙古王公贵族、僧侣集团可以修建寺庙、作坊和进行图书出版等事业, 同时贵族和活佛经常性地来往于国都和地方城镇, 参加行政事务和典礼仪式。在前苏联时期, 集体化牧场有医院、学校和其它的文化设施, 牧民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收音机、无线电台和报纸。

汉弗莱的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哈扎诺夫的观点。但实际上, 汉弗莱忽略了集体化专业生产时期游牧社区对外部世界的依赖。1991 年 1 月 1 日, 前苏联开始实行新的经济政策,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与前苏联的贸易要以国际? 市场的价格结算。此前,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 如运输、食品、能源和消费品价格和其它多边经济关系由经济互助委员会管控。蒙古国 94% 的出口和 97% 的进口贸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交易。而 1991 年之后, 蒙古国要以当时的世界市场价格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手工制品、食品以及机械材料, 而蒙古国的出口商品则要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竞争。²⁵ 不仅如此, 前苏联停止向蒙古国实施援助——经济稳定时期此类援助占蒙古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30%。此后, 集体化农场迅速贫困化, 医院、学校无法正常经营, 长距离移动所严重倚赖的大型运输工具由于缺少柴油而成为废弃物 (集体化时期此类运输工具由国家提供, 集体化牧场只需要以很低的价格购买柴油就可以), 私有化过程中分给没有经验的前文职人员的牲畜大量死亡 (集体牧场解体之后的私有化程序中, 牲畜作为财产而分给牧场工作人员)。²⁶

20 世纪初期王公贵族与僧侣集团之所以能够组织专业化的放牧, 是因为清朝对蒙古各旗的特殊政策使得原有的贵族阶层拥有世袭的地位, 并且划定旗界, 限制跨界流动。因此, 游牧社区原有的互助机制变为王公贵族、僧侣体团与普通牧民的雇佣关系。

²⁵ Goldstein M.C., Beall C.M., *Changing world of Mongolia's noma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15.

²⁶ Sneath, D., "The rural and the urban in pastoral Mongolia." In Bruun O, Li N. *Mongols From Country to City: Floating Boundaries, Pastoralism and City Life in the Mongols Lands* (eds.). Nias Press, 2006, 140-161.

**On Nomads' Society, Economy and Power -
Reading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by Khazanov**

Wurih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Khazanov's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a masterpiece in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orms of nomadic societies, uses rich field cases to explain in detail the types of nomadic societies, their organizational forms, their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ir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with different surrounding societies. Khazanov's *Nomads and Their External World* has to be repeatedly ci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contrasting agro-pastoralist social patterns, the origins of agro-pastoralism, and th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gimes in Inner Asian history.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is book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is paper, and the author concludes with a review.

Key words: Nomadic animal husbandry; nomadic social organization types; interaction patterns

[作者简介] 乌日汉, 1992 年生, 内蒙古通辽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2018 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1-11-20